

MU DAN AND HIS POEMS: A CHINESE-ENGLISH VERSION WITH
CRITICAL COMMENTARY

不朽的诗魂

穆旦诗解析、英译与研究

王宏印 著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不朽的诗魂

——穆旦诗解析、英译与研究

王宏印 著译

MU DAN
AND HIS POEMS

A CHINESE-ENGLISH VERSION
WITH CRITICAL COMMENTARY

BY WANG HONGYIN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Tianj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朽的诗魂：穆旦诗解析、英译与研究 / 王宏印著
译.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310-05573-9

I. ①不… II. ①王… III. ①穆旦(1918—1977)—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98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32.25 印张 4 插页 491 千字

定价：9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纪念穆旦诞辰一百周年

穆旦小传（附照片）

穆旦（1918—1977），著名诗人，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本名查良铮。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受到闻一多等前辈诗人影响，并直接接受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苏的授课。创作了《野兽》《赞美》等著名诗篇，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个人诗集，形成了自己硬朗深沉的诗风，代表着一代诗人的心路历程。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做随军翻译，亲历震惊世界的野人山战役，九死一生，后来写了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堪称战争诗篇的杰作。1948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53年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58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长期身心受到摧残，但坚持翻译英语和俄语诗歌，包括普希金的《奥涅金》和拜伦的《唐璜》，以及现代派诗歌艾略特的《荒原》与奥登等人的诗篇，翻译家查良铮享誉翻译界。穆旦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诗风，直接受到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晦涩难懂，变幻莫测，而后期诗风，主要是1975年以后的晚年诗风，显得更加深沉而含蓄，更多了一些后期象征主义的因素。《智慧之歌》《冬》是其后期代表作品。



1949 年 2 月 2 日离上海去泰国前照

初版前言

中国是诗国，是闻名世界的诗歌大国。以《诗经》《楚辞》为渊源，以唐诗宋词为代表，她的古典诗歌和诗论曾经达到过世界诗歌的顶峰。到了现代，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哺育的西方现代派诗歌反哺回来，以西学东渐的新的姿态，通过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内在机制，又促进了中国新诗的诞生和发展。这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异军突起的新诗高潮。

40 年代现代主义新诗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高峰地位。它意味着中国新诗开始与世界诗潮汇合，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做了准备。在 40 年代以前中国新诗的主要方向是从语言和感情、意识上摆脱古典诗词的强大影响。反叛、创新，以古典语言和思想感情，走向现代化是五四文学运动后新文学的创新总倾向。但一直到 40 年代，才因为形势的发展新文学获得突破，走向普遍的成熟。（郑敏：《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见郑敏著《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24 页）

实际上，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运动所推向的诗歌高峰，如果在时间上再宽泛到前十年即包括少数 30 年代诗人到 40 年代或稍后些，在这样一个较大的视野里更容易看出中国当时的新诗是中国和世界诗歌传统的一个总继承，或者说是当时中国种种矛盾的一个小缩影——都浓缩在以内外战争为背景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她的知识分子的挣扎、感受与呼救中。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懂外语这一共同的语言基础上，可以说分别继承了中外古今的诗歌传统而又各有侧重：偏重于继承中国古典诗词而又融化了某些现代主义写法的如卞之琳，偏重于借鉴继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传统而略有文言味的如稍早的李金发，偏重于继承德国浪漫主义和奥地利玄思派的如冯

至，偏重于从英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的如穆旦，偏重于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如唐祈、杜运燮等。在这一代新诗精英中，穆旦无疑是其中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后起之秀。

穆旦（1918—1977）本名查良铮，出身于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而又没落的商贾仕宦家庭，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步入清华后更是刻苦求进，但他真正的诗歌学校是西南联大。由于战争的步步进逼，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撤出北京和天津，转移到长沙，又从长沙出发经过一次文化长征，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云南，一度在边陲小城蒙自，最后定居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壮举。当时集中了三所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流教授和一批有志求学的热血青年。在文学和诗歌方面，就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还有外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苏等从事文学和诗歌教学。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穆旦和后来一起成为“九叶派”诗人的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一起，通过名师的指点，接触到叶芝、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燕卜苏等现代派大师的作品，并积极投入新诗的实验和创作中去。诗歌评论家谢冕教授曾十分恰当地评价了当时的诗歌盛况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联大师生以其开放的视野、前驱的意识和巨大的涵容性，在与大西北遥遥相对的西南一隅掀起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的“中兴”运动。（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见《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如果说良好的先天素质和勤奋的书斋读写是造就诗人的温床，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命运的经历则是造就诗人的课堂。在后一方面，穆旦具有某些奇特的个人的生活经历，构成他的诗歌艺术非同寻常的机理品质。他作为护校队队员，亲历了那跨越湘、黔、滇三省，全程3500华里的文化长征，一路进行文化考察，“沿途随读随撕读完一部英汉辞典”。他曾任中国远征军的随军翻译，深入滇缅的抗日战争前线，经历了野人山战役的生死考验，断粮八天，从印度转程回国。在留学美国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外国文学，而且在英文之外进一步打好了俄语基础，为他后来的英

俄两种语言的诗歌翻译做好了准备。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先是留校西南联大，办过报纸，当过翻译，而回国后就一直在南开大学外文系教书。也就是在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崇高位置上，他受到了长达二十年的错误的政治对待，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改正，但他一生始终没有停止过诗歌的翻译或创作。

诗人穆旦的诗歌创作和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4—1937）尝试期：主要是南开中学阶段，开始在《南开中学生》上发表诗作，已经显示出早慧和诗才。

第二时期（1938—1948）高峰期：从清华到西南联大，再到1948年出国留学为止，穆旦的大部分诗作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创作思想、语言风格上最具代表性。

第三时期（1951—1957）受挫期：从留学归国到“反右”运动，以《九十九家争鸣记》招来大祸，结束了这一时期艰难的适应和很难适应的创作实践。一般说来，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不很高，数量也不大，但有些诗作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第四时期（1958—1977）翻译期：1958年接受机关管制，不能发表诗作，诗人以本名查良铮（实际上译作开始于1953年）发表大量翻译作品，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普希金、丘特切夫等俄国诗歌以及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派诗歌。其翻译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为译者赢来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的荣誉。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1977年诗人去世。

第五时期（1975—1976）圆熟期：1975年只有一首《苍蝇》戏作，从此，诗人重新拿起诗笔，1976年诗人有近30首（组）诗作，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圆熟老到炉火纯青的很高境界，与前期诗风有明显不同。

诗人一生共创作诗歌146首（组），出版诗集8部（生前3部：《探险队》1945年，《穆旦诗集》1947年，《旗》1948年），翻译作品25部。此外，还写有少量论文，而其诗歌理论则反映在为数不多的书信中。

这个选集，虽然只是穆旦一生新诗创作的不足半数，但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最优秀的诗作代表。这些诗作一方面记录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的重大事件（如《原野上走路》《森林之魅》），反映了诗人成长和成熟的基本历程（如《智慧的来临》《三十诞辰有感》《老年的梦呓》）。另一方面，则可以按

主题把他的全部诗作归结为十大类别：劳苦大众（如《更夫》《报贩》《洗衣妇》）、民族命运（如《野兽》《合唱二章》《赞美》《控诉》《饥饿的中国》）、战争思考（如《出发》《奉献》）、浪漫爱情（如《诗八首》《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自我追寻（如《自己》《我》《听说我老了》《问》）、自然景色（如《云》《黄昏》《自然底梦》）、精神信仰（如《祈神二章》《隐现》）、生存处境（如《被围者》《活下去》《智慧之歌》）、文明反思（如《良心颂》《暴力》《城市的街心》）、诗歌艺术（如《诗》）。

穆旦在我国新诗创作上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塑造了“被围者”形象，使得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与“倦行者”和“寻梦人”三足鼎立的格局得以形成。“被围者”是一个人群，他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孤立无援的状态，和急于突围得救的生存意识与消沉涣散的民族存在状态。“被围者”是一个自我，他生动地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强大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包围中而不得出的狂躁心态和沉沦过程。“被围者”是一种文化，他不写实体也不写关系，而是写一种个体群体在时间和空间化一的旋转和沉没的惯性中肉体无法自救灵魂无法拯救的悲惨处境和悲剧氛围。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穆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被围者”较之“倦行者”和“寻梦人”深刻得多，普遍得多。作为智慧型诗人，即使一生未能杀出重围，也很少流露出倦行的老态和寻梦的幻灭，倒是显示了一贯的荒原意识。这是诗人穆旦一生新诗创作能保持形上高度和独立品位的文化心理动力学上的基本定位所使然，也是至今读他的诗仍然使人能在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之余感到“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文化心理内涵的奥秘所在。

至于穆旦新诗的语言艺术风格，谢冕教授有一段十分中肯的描绘：

但穆旦更大的辉煌却表现在他的艺术精神上。他在整个创作趋向于整齐一律的格式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而为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的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他使疲软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的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精神与极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

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粹”的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见《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对于这样一位卓越的诗人的诗作，要进行解读和翻译又谈何容易？何况诗，作为语言文字的艺术作品，本来就是诗无达诂而又不可尽解的。于是，我们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根据每一首诗的具体情况，从总体上或者在局部上给予必要的文字层面的疏通和意象上的解释，以及主题上的探索和诗路上的说明。之所以要做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就是因为穆旦的作品有相当的难度和深度，与现在的青年读者又有了一定的距离，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起一点“解”读的作用。好在个别的诗作，例如《诗八首》，已经有了郑敏、孙玉石等教授的解读可做参考，但见仁见智和篇幅的要求不同，自然也就各有不同了。归根结底，赏析或解析毕竟只能提供参考，而读者的阅读欣赏才是诗作的最终裁判和艺术过程的最终完成。

至于穆旦诗的英文翻译，主要是为了有助于向外的流传，使更多的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借助译文了解这位杰出诗人的作品的概貌，或者也可以为懂英文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些英汉汉英翻译比较的机会和材料。若说到要完全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韵味，甚至要达到“信达雅”的高标准，实在是很难。总体而言，译者有三点体会和做法：第一，穆旦的诗借鉴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很少，而受到外国现代诗歌写法影响的地方很多，而且是用纯粹的现代汉语所写，因此与英语在词组和句子水平上比较契合。这是译文基本上采取直译法的比较语言学的根据。第二，穆旦的诗虽然分节，但是句子往往很长，节与节之间有时很连贯，有时甚至整首诗就是一个句子，因此造成连贯多于间断的特点，使得翻译时很难用标点，尤其是很难用句点断开。译者在翻译时的处理方法是：只要不影响层次划分或语义明晰，宁可保持这种连贯而不强行分开。第三，在意象组合和时空调度上，诗歌的意义布置和心理接受的前后顺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译文尽量尊重原诗的分行分节和语序安排，除非有绝对理由，一般不做较大幅度的语序调

整，即便忍受不太通顺和转折突兀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新诗的特点之一。至于这样翻译的效果如何，尚有待于读者尤其是外语读者评价和批评。

穆旦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现代诗人。他所在的南开大学外文系也是自己目前任教的单位。能够为这位杰出的诗人和翻译家的作品的传播和研究做一点事，是我感到十分光荣而有意义的。至于是否做得完满和理想，就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且有待于海内外诗界学人的共同努力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宏印（朱墨）

2001年12月于南开大学

新版序言

在纪念穆旦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一本旧作能够重版与读者见面，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不知不觉，时隔十七年矣！

在重版的序言里，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强调一下。那就是关于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开端和发展问题，由此可以进入重读穆旦诗歌的意义。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可以说，是反对古典的格律诗的与旧诗相对应的新诗概念，其中混杂着一些自由诗的概念，甚至仍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诗的写法，例如徐志摩的诗歌。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现代派诗歌，主要受到西方的现代派诗歌创作手法和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国的波德莱尔为首的现代诗歌（象征派诗歌），以及英美的艾略特和奥地利的里尔克等写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的现代派诗歌。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所从事的诗歌创作，就属于这个现代派诗歌的阵营。那是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出现的一个青年诗人的流派，他们一共有九个人，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刊物上集中发表诗作，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其创作成就体现为1981年以九位诗人的名义合辑出版的《九叶集》。就来源而论，他们九个人实际上又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正宗的智性现代派，包括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几人，他们属于西南联大诗人群，穆旦在其中，无疑是最年轻、最有才华和成就的诗人。另一派大约是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的，他们中间有辛迪、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等。无论如何，40年代的九叶派是中国现代诗歌最早的最正统的一个流派，似乎是无可置疑的。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现代诗歌，进入了一个转折期。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一，40年代的所谓的现代派诗歌，因为是“国统区”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不太提及了。第二，当然是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以及对于新诗的主张不同，积极提倡以新民歌体为主，押大体和谐的韵，采用方言形式所写的新诗，成为主流。而这个40年代的受西方影响的

新诗，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不可接受，以至于许多年后，当有人读到穆旦的诗作，还是那样的觉得陌生，不可理解。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后，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朦胧”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欧阳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群体，朦胧诗派属于“文化大革命”地下文学，后来转入地上，许多诗歌发表在《今天》杂志上。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未发表过诗歌宣言。但一般认为朦胧诗精神内涵有三个层面：其一，不满和揭露现实，进行社会批判；其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具有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其三，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除了直接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如果把朦胧诗也算作中国的现代派诗歌的话，因为它并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正统的训练和直接的影响，所以在艺术上并非完全成熟，其成就，一般说来，也不能和40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成就相比，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诗歌在枯木逢春的历史时期一次新的革新的浪潮。

中国台湾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衰落于7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诗歌，是整个中国新诗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悦然曾说：“我认为台湾现代诗是中华文化的一面里程碑。”（《二十世纪台湾诗选》，马悦然、奚密、向阳主编，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版序》第3页）诚然，台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方。早期的台湾少数民族的原始遗风姑且不论，后来的西方殖民和日本人的统治，使这个小岛具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要素。1949年天翻地覆的革命之后，国民党的一些精英人物和军政要员去了台湾，其中包括胡适、傅斯年等人在内的五四运动余脉，到台湾后对当地的学术、文学，乃至政治、思想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如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等有才华的一代，在台湾的现代文化发展中占领了前沿和制高点，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也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文学及艺术的复兴运动。

台湾现代诗史通常将50—60年代视为三大诗社鼎足而立的局面：即纪弦一九五三年创立的《现代诗季刊》与一九五六年的“现代

派”；覃子豪、钟鼎文、夏笳等一九五四年创立的“蓝星诗社”；以及张默（1931—）、洛夫（1928—）、痖弦（1932—）同年创立的“创世纪”诗社。（《二十世纪台湾诗选》，马悦然、奚密、向阳主编，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第51页）

这一时期台湾诗坛诞生了余光中、叶维廉、纪弦、痖弦、洛夫等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享有盛誉的诗人，他们对汉语新诗如何借鉴西方理论，如何创新等问题既做了理论上的争鸣与探索，更做了创作上的革新与实践，在汉语新诗发展的历史上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属于现代派诗歌的主流，而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余脉）。1956年2月1日出版的《现代诗》第13期，刊登了纪弦的《现代派信条释义》，还发表了“六大信条”，表达了十分激进的现代派诗学观念。这是大陆现代派诗歌在理论上难以比拟的突出现象，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诚然，海峡两岸，一水之隔，其新诗的创作殊途，分开了两岸风流。但无论如何，台湾的现代派诗歌和大陆的朦胧派诗歌都已走过了它的繁华期，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诗歌的创作已进入一个反现代派或后现代派（后现代主义）时期。在这一方面，就现代派诗歌的对外翻译和接受效果而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无疑走在了中国大陆的前面，例如，洛夫作为台湾诗人，在接连获取几个大奖之后，移居加拿大，开始了他的“天涯美学”的诗歌创作体验，成就可谓蔚为大观。大陆朦胧诗人中的顾城，客死异乡；新锐中的海子，卧轨身亡；而北岛，在经历了多年的漂泊之后，回到香港；杨炼，依然在漂泊和探索中。中国的现代诗，在“北京诗派”的旗帜下，仍然在进行艰苦的探索和仔细的打磨，被德国汉学家顾彬推崇和翻译的王家新等人，也在持续地发生影响。中国当代的现代诗歌，和后现代诗歌，正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在穆旦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重读“九叶”派代表人物穆旦的诗作，加以解读和翻译，也可谓是经典重读，兼有传播的推介作用，也就显示出另一番不同寻常的意义来。

关于穆旦诗歌的英语翻译，是基于穆旦诗歌的研究而进行的一项严肃的工作。它属于现代派诗歌的翻译，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上，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路子。本书初版的前言中，

我曾经结合“信达雅”三字诀，讲了自己的几点做法，现在再举一首诗作为例证，来说明我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在我的几个文学翻译选本中，都曾经选过穆旦晚年的代表作《智慧之歌》。这首诗意象繁多，哲思绵绵，情感深沉。翻译不易，但值得一试。庞秉钧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一百首》中，选译了这一首，其英文地道，别有特色，可供参考。而我的译文，讲究诗性智慧的传达，讲究行进的速率和节奏，每一诗节的情绪变化会有体现，但个别地方有创译成分，以求特殊的诗歌效果。以下是这首诗的翻译和每一节诗的说明：

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1976年)

【英文翻译】

SONG OF WISDOM

I've now reached the end of fancy,
Where lies a foliage-shed forest;
Each leaf stands for a kind of joy,
All heap up in my heart, withered and dry.

One joy is the love of youthful days,
They're shooting stars far in the night space;
Some can be found nowhere, and forever gone;
Some land at my foot, cold and hard.

Another joy is a hubbub of friendship,
Full blossom knows no incoming fall;
Society's stereotype dammed boiling blood,
Life's cold current shaped passion into reality.